

传教士郭士立在华办报的动机探析

徐梦迪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湖北荆州

【摘要】郭士立是第一位深入中国内地的新教传教士，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创办中文报刊的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的种种身份和行为都体现着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既是传播福音的上帝使者，又是侵略者。这也为他在华办报的动机也增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关键词】郭士立；办报；动机

The motivation of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a missionary, in Running a Newspaper in China

Mengdi Xu

Yangtze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Hubei Jingzhou

【Abstract】 August Gützlaff is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s inland, and he founded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Guo's all kinds of identity and behavior reflect his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he is both the messenger of God and the aggressor. All these help adding confusing colors to his motivation of running Chinese newspaper.

【Keywords】 August Gützlaff; Running newspaper; Motivation

从历史来讲，基督教是欧洲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它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界定为欧洲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不分种族地普遍存在着群体感，如果说 1095 年的十字军东征是为了上帝，那么始于 15 世纪的殖民扩张则是为了“上帝和黄金”。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扩张之后，欧洲人把思想、经济、外交和政治方面的能量集中阐述为一个标准，并用它来判断非欧洲社会是否已经充分“现代化和文明化”。19 世纪，“白人的责任”这一思想助长了西方对非西方的社会经济统治。在统治手段中最重要的是借助于宗教。彼时，在西方文明中，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经济学家，不是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多国公司的经理人员，他们是传教士。

1807 年，马礼逊受遣来中国传教，是为基督教新教传入我国的开端。尽管重重受阻，但马礼逊之后的传教士们还是将目光锁定在了处于东亚文化圈中心地位的中国。郭士立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的新教传教士。和其他传教士一样，郭士立起初仅活动于东南亚一带，马礼逊等人在此组

建的“外方传教团”在这一地带已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此氛围影响之下郭士立产生了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进行传教的愿望。他幻想中国皈依基督教，如同英国商人幻想中国的市场向他们开放一样。宣讲教义是极为有效的方式，可传教士们面对的是源自于不同文明的群体，宣讲的是“不被这个文明所理解的东西”。讲道既然不可能，他便抓住印刷术，企图通过它达到传递信息和刺激虔诚的目的。而此时，经历了争取信息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斗争，报纸已经在西欧各国广泛兴起。1833 年 8 月，郭士立于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一份由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中文报刊。吴廷俊先生称郭士立以“鬼神莫测的手腕”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 商业侵略的动机

在创办报刊之前，郭士立完成了在中国的三次侦查航行。

第一次航行，郭士立受英国东印度公司聘请担任翻译兼医生。这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沿海地区作一次较为详细的侦查，摸清这个“天朝大国”

在北方口岸可以开放的潜在市场；中国人对“西洋”商品的需求以及预期的价格；中国出口的货物如茶叶、丝等的价格。

第二次航海侦查之后，郭士立察觉到了中国内地潜在的商机。郭士立发掘中国的海防不堪一击，如果发动战争，中国很可能迅速被殖民，进而融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他在航海日记中提到，西方国家要想彻底打开中国市场，与中国长期进行贸易往来，需要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来实现，“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第三次航行，郭士立受雇于一位鸦片商人，担任翻译。这时郭士立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创办一份中文月刊，正式投入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和鸦片商人达成的协议是，商人负责《东西洋考》出版前半年的费用所需。他在日记中写道：“长久以来我心中便怀有这样的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中，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833年6月23日，郭士立在《东西洋考》的创刊计划书中阐述了他的办报宗旨：“当文明在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唯独中国人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长久以来我们和他们都有交往，但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其他所有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利益，以及与中国人的交往……”这份计划书很直接地表达了他办报的目的，即维护西方来华人士的利益，扩大与中国的交往，从而使中国市场为西方商业资本打开大门成为可能。商业利益是郭士立办报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的办报活动需要西方商界的捐赠与支持。这就决定了在他的报刊上，不得不以文字作为宣传工具，为商界的利益出谋划策。比如他在《东西洋考》上面发表的言论：“禁止通商，如水底捞月矣，故明君治国，必竭力尽心，以务广其通商也……”“惟容商贾任意而贸易，此之谓放纵也，薄其税敛，开口准商船付诸埠头，不专设洋行，而允个人买卖，任其自主以经营也，故此诸邦准由商人自由赴市交易，生意兴隆，而国家亦长享太平之福，而兴旺焉……”

1839年起，英国开始武装入侵中国，至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所有在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中，

直接参与战争的只有郭士立一人。战后，《南京条约》的谈判与签订的过程中，他又以翻译的身份全程参与。马礼逊夫人及其编撰的《马礼逊回忆录》中提及郭士立之处有这样一段注释：“他在中国沿海……侦查10次以上，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以及在澳门、广州的英美走私鸦片的商人报告侦查结果，接受大鸦片商的巨款。”

结合郭士立的行为来看，他在中国办报的动机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商业侵略的目的。

2 纯粹的传教动机

郭士立利用一切机会在华人中间传教。初到中国探险之时，他将载着教义的传单沿途散发。随行的商船靠岸时，他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随身携带的西药医治当地的百姓，通过与病人的聊天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借机传道。沿途虽有收获，但郭士立认识到中国人的心中似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传教障碍，“他们对异族的轻视、对祖先的骄傲，以及对所有他者的厌恶感在宗教方面表现得尤为强烈。”

中国人的抵制没有使郭士立退却，他决定以一种华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感化他们。“乃要成为中国人，方能盈取中国人”。于是郭士立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他甚至“归宗”于当地一处由福建迁往南洋的郭氏家族，为自己取名“郭士立”，这也是他汉译名的由来。

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时，郭士立全刊使用汉字。为了获取中国人的好感，他为自己署名“爱汉者”。印制方面，为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郭士立采用了从右至左的印刷模式，模仿中国传统的线装书模板进行报刊的装订，并采用中国式纪年而非公元纪年，例如第一期封面最上方的时间是“道光癸巳年六月”。内容方面，初刊的目录依次分为序、东西史记和合、地理、新闻、东南洋并南洋国五大板块，对东西方历史、世界地理、各国近日奇闻轶事以及东南亚诸国都有所涉猎和介绍。语言表述方面，郭士立模仿《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做法，在文章中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巧妙的运用中国传统儒学的观点来阐述所要说明的问题，创刊号的‘序’全文仅八百余字，引用《论语》达10次，其中有二十多处引用了孟子的言论。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和表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推崇，更是为这份初生的报刊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相较于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宗教性质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宗教教义在刊物中已经不是主要内容。然而这只是郭士立的传教策略。《东西洋考》虽披上了世俗的外衣，却将基督教义融入传统的义理说教甚或生活常识中。它确实从神坛走入民间，但却从世俗化的内容中，处处可见上帝的影子。

《东西洋考》刊载了大量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文章，其落脚点在于炫耀上帝出生地的富庶和辽阔。曾有学者提出，《东西洋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包装，意在打破中国人对外族固有的“蛮夷”观念。在对比国家之间的强弱和人种之间的优劣时，郭士立意在宣扬西方的先进文明，贬斥亚洲的落后文明。郭士立曾这样说过：“如果欧洲人计划征服中国，并付诸实际行动，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般饱受奴役。对比印度如今所享有的人权和宗教的自由，科学的进步，以及他们得到的基督教真理，中国似乎永远在倒退，在呻吟与专制统治之下，在永远的与世隔绝之中灭亡。”这段话体现了郭士立作为欧洲人的优越感，表现在具体的办报过程中，他认为与其等待中国人自觉感悟，向传教士们敞开心扉，不如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确信，他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很多，这样就可以使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帝，接受上帝福音的感化。鸦片战争的全过程，郭士立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配合英国人的武力入侵，然而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与签订过程中，他却伺机向在场的满清大臣们分发圣经。

如果把郭士立在华办报的动机形容成一座“金字塔”，那么“对华传教”始终是这座建筑的基石，深埋于心。

3 结语

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对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一些物品产生渴慕，他们想通过自由交换获得，而中国似乎不屑一顾。于是西方先后用传教以

及军事侵略的方式无礼地打开中国的大门，企图让中国心甘情愿接受他们的文明和他们文明里的价值观、宗教信仰和体制。郭士立是派遣来中国的传教士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集侵略者与传教士于一身的人物特色恰好体现了19世纪西方世界所追求的“上帝与黄金”。

参考文献

- [1] 约翰·赫斯特（澳）.《极简欧洲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4页。
- [2] 塞缪尔·亨廷顿（美）.《文明的冲突》[M].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第44页，第45页。
- [3]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 [4] 高静.《东学西渐视域中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研究》[D].西北大学，2007年。
- [5] 贺忠，罗志娟.《行走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中国最早的中文报纸〈中西洋考每月统计传〉》[J].新闻爱好者，2009（8）。

收稿日期：2021年5月10日

出刊日期：2021年6月17日

引用本文：徐梦迪，传教士郭士立在华办报的动机探析[J]. 国际教育学, 2021, 3(1): 45-47.

DOI: 10.12208/j.ije.20210009

检索信息：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2021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